周恩来与统一战线作品选登

我为周总理治病

陆琦 口述 朱敬平 陈淑莹 整理

我是一名开业的专科医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后经过历次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旧人生观发生了改变，逐渐认识到医务工作者应为工农开门的真理。于是，我向当时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了报告，是关于公开我的祖传秘方“内痔插药疗法”的，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不开刀不吃药，不影响生活。

1954年间，华东卫生部批复交省卫生厅办理，当时省卫生厅厅长李蓝炎亲自批示，要我在二院进行插药实验工作。这个实验做了一年多，经过临床实验，总结了110多例的病例。最后这个报告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给我奖状，还发给我3000块钱的奖金，那时候3000块是很高的了。1955年左右，由省卫生厅安排在解放路太平洋电影院召开学习祖国医学表彰大会，参加的是全省各地医卫人员，大概到会五六百人，会上省卫生厅代表卫生部颁发奖状和奖金，对我进行表彰，鼓励我，掀起全省学习祖国医学的热潮。后来，接到省人事厅通知，发一个委任状给我，委任我为肛门科主任，在浙二建立肛门外科。1957年院系调整，我随之到浙一院工作。

1956年杭州市副市长陈礼节来动员我，要我参加民进。后来，我由浙二医院的院长余文光、浙二医院胸外科主任石华玉两个人作为我的入会介绍人，在1956年底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大概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突然省卫生厅的同志来找我，同时来的还有公安厅第三处的同志，说请我去会诊。什么事情他们也不讲，而且要马上准备走，我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从没有遇到过，家里也很担心，当时准备好了就跟他们走了。有卫生厅、公安厅三处的同志陪我去，一去就到了飞机场，飞机场有一架专门飞北京的飞机，飞机上就我和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来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长——黄树则，他把我安排好后才同我讲，是周总理啊，叫我看病，才晓得这个事情。本来我一直担心，什么事情一直都是保密的，从杭州离开到北京，一直在担心。到了北京知道是为周总理治病的时候，才放心一点，我胆子也很小的，毕竟这是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看病。第二天，工作人员把我领到周总理办公室，让我为周总理做了一些检查。当时周总理这个痔疮比较严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所以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把这个炎症赶快消失，同时提出来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要我采取一些措施。我拿出最好的技术给他配药、开方子，各种看家本领都用上了，经过一个礼拜治疗，炎症很快地消失了。周总理也很高兴，因为他整天在忙国事啊，国家的事情当时很多的，他基本上都是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钟，第二天上午都是十点多才起来，我们都准备好，等他起来，给他继续治疗。中午基本上都是在西花厅吃饭，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叫卞知强，一个保健局局长，有时候部长也来，多数是保健局局长负责的。炎症消退后，我们又给周总理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这个坐浴的架子能折拢，随身好带的，便于他清洁局部。大概十多天后，我回杭州了。回来以前呢，周总理给我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照片，当时能得到周总理签名的照片也不容易的，这个很珍贵。这是第一次为周总理看病。

第二次呢，是1961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大概早半个多月，周总理到杭州来了，住在西湖饭店，卫生厅又叫我准备好，也住到西湖饭店去。周总理同我讲，这次毛主席给他一个月的假期，总算空下来了，过年以前，到杭州来休养又治病，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痔疮医好的。而我当时也改进了方法，进一步地把这个药再改进，筛选过以后，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国事太忙了，在治疗期间还要经常会见外宾。有一次宴请外宾的时候，周总理要我也去，而且给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坐，他对一个普通的医生这样看重，我内心非常感动。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后，周总理的痔疮基本上是痊愈了。当时周总理考虑到正是接近过年了，春节快到了，就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宴请的时候邓大姐就讲了，她同周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同学关系，她和周总理是同学；第二个关系是战友关系；第三个关系是同事关系，他们一起工作；第四个关系是夫妻关系。这四种关系，邓大姐是在吃饭的时候站起来讲的。后来周总理提出来要吃点酒，他说这么多的人为我个人服务，我要敬陆大夫。那时邓大姐问我了，陆大夫，你看周总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说，周总理痔疮基本上好了，身体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点点，也能活血健身。周总理听我讲了，说好，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周总理为人，很尊重人民。

周恩来总理与陆琦教授

在这次吃饭以前，周总理又请邓大姐到我家里来。周总理同我讲了，他说我们就要回北京了，叫邓大姐到你家来看看你的老母亲。我说这怎么担当得起呀，我只是个小医生。但是周总理交待下来了，邓大姐第二天就到我家里来了，看看我的老母亲，看看我的老伴，还有四个孩子，我当时很感动。邓大姐还征求我老母亲的意见，说请陆大夫同周总理到北京过年。这真正是我意料之外的，周总理很尊重我老母亲的意见，所以我们全家非常感动，觉得我们家里做喜事一样的，喜事临门，非常激动，又高兴，又感谢周总理的为人。

于是年前我就跟周总理一起去了北京。周总理有专列，路上还安排我一个人一个房间，一路过去，经过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后，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旧早上为周总理换药与痔合处理，吃饭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到了年关接近的时候，要过春节了，周总理交待秘书，打电话到杭州，把我爱人接过来，一起在北京过春节。我爱人到了北京以后，周总理也接待了我两个人，夜里亲自点菜，招待我们夫妻。当时他点的菜，有些我们从没吃过啊，比如那个黑米粥，我不晓得米还有黑的，可烧成粥的，我毕生还是第一次吃到黑米粥。当时冬天北京很冷啊，里面当然有暖气，外面很冷，吃到黑米粥特别惊奇。这个黑米粥哪里来的呢，是四川那边出产的黑米。还有新疆带过来的哈密瓜，我也没吃过，我只晓得有哈密瓜，也没尝到这个味道，也没有看到过。当时是冬天，都是使我非常新奇的，一个小医生能吃到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容易，而且还是周总理亲自点菜。

在北京的时候，一般晚上周总理会都叫他的秘书成元功，又是卫队长，每天晚上安排送我到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小剧场，周总理喜欢看京戏，也送我去看看。他一般工作好了来，要迟一点。有时候小剧场会演爱国主义的话剧，内容都很好的，叫我去看。而且第二天早上药换好了以后，周总理还会问我，你看了这个剧本有什么感想。我说我看了以后，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太好了，很生动，演得非常生动。当时这些剧本选出来首先要在小礼堂演，领导人看过以后才好经过审查批准，才对外面演，所以演得都是很精彩的。这样我每次看过表演后，上午为周总理治疗，都要向周总理汇报我个人的感受。另外一次呢，周总理又安排我夫妻两个人，安排车子送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去看看，看看这个雄伟建筑。当时邓大姐说，这样吧，把我的车子让陆大夫夫妇两个人去，我去上班同周总理拼车，免得再麻烦车队里又安排。在十三陵的时候，那个司机特地给我们拍了照片。周总理对我这样信任，这样爱护，真令我们无比感动。又有一次，周总理晓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跟我们夫妇俩专门拍了照片。周总理有个专门的摄影师，在杭州的时候，我也同周总理拍过合影，周总理对我非常爱护。

我平时同周总理接触比较多，每一天早上九点多就去，等周总理起来。周总理夜里总要工作到凌晨两点多钟，早上十点多才起来。等他洗好了，我们再去为他治疗。跟他接触的时候，看到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衣服，作为总理，我想总是应该穿新的，但是他不是这样，他的衬衫，好补的总要补一补，这个也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能看见，平时谁看见呀。比如他要去接见外宾了，才带好的手表，一个金表，平时在家里都是戴普通的表。这些都说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节约的，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的。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是我们接触，我看在眼里的，外面是想不到这种事情的，说明周总理真是鞠躬尽瘁啊。

从北京回来以前，周总理请我们吃饭后，邓大姐提出来，这段时间的粮票要我们收回去的，当时我们国家吃粮食都要定量的，我们当时带去一些全国粮票，吃多少天就交给他们多少的粮票。走的时候，邓大姐还拿出了工分券，当时买东西都要工分券的，是国家发的，每个人定量发多少，比如说每个人买几尺布啊，当时我们国家建国不久，物资还比较匮乏。她拿出工分券，拿给我爱人，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买点实用的东西带回去。邓大姐想到了，我们没有带工分券，粮票是随身带的，吃一顿是要粮票的。走之前还送我们礼物。邓大姐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在会上发的一条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爱人。周总理把去东欧访问带回来的一个工艺盆子，也送我做纪念。这些都是小的事情，细微之处彰显他的为人啊，关怀爱护真是感人心扉的。

陆琦，98岁，1956年11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痔科(肛肠外科前身)创始人，也是我国痔科事业的开拓者，对我国痔科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周恩来对黄维的半生恩情

黄慧南

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大门右侧是周恩来总理题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左侧是“抚顺战犯监狱”。

在国共决战的三大战役之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陆军中将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随后，他率领第十二兵团兵败双堆集，于1948年12月15日成了共产党人的俘虏。

自此，黄维有了另一个身份——战犯，直到1975年被特赦，他在战犯管理所度过了27年。

黄维的改造生涯可谓坎坷而漫长……

在功德林，黄维病倒了

1952年的春天，当黄维病危被抬进职工医院时，他觉得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不相信共产党能治好他的病，一度拒绝治疗，想一死了之。

经医院确诊，黄维原本患有重度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颈部淋巴结核、附睾丸结核，这次由于腹膜炎急剧恶化，出现了浮肿腹水，病情危急，需要马上注射链霉素，强心剂，葡萄糖和进行手术。黄维的病情惊动了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经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使用国家仅有的一些外汇，不惜高价，购买进口特效药，由北京医院抽调专家组成了医疗队，挽救黄维的生命。

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职工医院中，辟出几间病房，治疗战犯病人专用是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我的父亲黄维在特赦后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

当时给我治病，那是费了相当大的力气的。那时治疗结核病的药物，如链霉素和青霉素，我们国内自己不能生产，都得靠苏联进口，可是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而英、美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虽然过关，却对中国大陆封锁。于是我治病需要的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病治疗得很及时，很不错。

事实上，在国民党战犯中，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和我一样，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在这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是差不多就要完了，又被抢救过来。有好几次，病情已经稳定，回到战犯管理所休养治疗。可是病情一反复，马上又被送回复兴医院(原功德林职工医院)。我这两条腿在病重的时候，肿的油光发亮，皮肤裂开并流水，腹部水肿也很厉害，一般的腹水是可以用导管来放水的，可我患的是结核病，用导管排水会使结核扩散，只能靠药物来排除。有一次，我病情恶化，又被送进复兴医院，打青链霉素，每隔四个钟头打一针。这样我一共打了有300多针。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这样想，共产党对于我这样的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我很自然的联想到，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战犯宣布的宽大政策、改造政策，看来还是真诚的，是可以相信的。我本是共产党人的敌人，是个罪该万死的人，共产党不但不杀我，还千方百计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我能不感动吗？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对这批战争罪犯“要做到一个不跑，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的指示，国家在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拿出366万元，新建了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管理所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一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骂；二是保障生活条件，物资供给相当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三是保障身体健康，救扶伤，治病救人。

“当我们受到疾病与死亡威胁时，管教们待之如亲人”，这是战犯嘴边常说的一句话。据资料记载：战犯患肺结核的123名，至1953年全部治愈。

周恩来总理还亲笔点定战犯吃细粮，每日三餐，区别将官、校官(佐)、尉官，分小、中、大三个灶别。战犯们每日三餐细粮。黄维系国民党中将，则每天有牛奶鸡蛋特供增加营养。

最后一批特赦的第一名

1975年3月18日，抚顺高尔山上的积雪刚刚融化，高墙内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认为关押的战犯都已经过了20余年的改造，基本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把他们统统释放，一律特赦。

由于东方红发动机实验的失败，黄维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过分的苦思极虑，黄维的缺血性心脏病复发。恰在这时，中央准备全部特赦战犯的消息传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经研究决定，送黄维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高干病房，由专职医生和护士进行监护治疗。为此，管理所请示公安部，此事还传到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给予批示，可以将特赦的决定先透露给黄维，但要严守机密，只能让黄维一个人知道，这样能有利于他配合治疗，加快治愈进程。

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失去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3月21日晨曦中，从沈阳开往北京的12次特快列车徐徐地停靠在北京站的站台上，黄维一行走下列车，中央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就热情迎上前来招呼，大家乘上大客车，来到北京前门饭店。

3月23日午后，黄维等300余人，分乘五辆大客车，来到北京饭店，黄维的妻子蔡若曙，女儿黄敏南也参加了接见。

5时许，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民主人士共80余名，从侧门走进大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致敬！叶帅等领导人挥手致意。

黄维从左边第一个座位上站起来，走到鲜花簇拥的麦克风前，带着激动有些颤抖的声音代表全体被赦人员宣读《致敬毛主席党中央的感谢信》。

黄维动情的发言回荡在大厅内，每个获释的人都沉默着静静谛听。黄维的决心与心愿，在他们心中回旋着共鸣。席间文强、蔡省三也相继发言，诉说自己的体会和心声。

坐在正中的叶帅挥挥手，用他洪亮的声音，重申了党和国家对战犯的政策，每个人都有公民权……

1975年的6、7月间，有关部门组织一批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先后到了延安、西安、宝鸡、洛阳、郑州、三门峡，这些地方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到之处，看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延安，黄维看见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期间住过的窑洞，条件是何等的艰苦，可共产党的领袖们，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硬是点燃了星星之火，指挥军队，率领人民创建了新的政权。

黄维深深感到，中国人民确实是站起来了，今非昔比，这是他最想看到的。

1975年，黄维被特赦，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亲口告诉黄敏南：“当年你高考后，虽然考分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因为父亲黄维的战犯身份，复旦大学一时不敢录取，层层上报，最后请示到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黄敏南才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

参加周总理邀请的国宴

1975年9月30日下午，应周总理邀请，黄维接到请柬提前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当时周总理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周总理能否出席在宴会上？在宴会即将开始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突然掌声雷动，人民的好总理缓步走到来宾中间。黄维对他身边的同仁说，周总理堪称天地正气，古今完人。今天在这里见到总理，将是我感动一生而又至死难忘的一天。

黄维出狱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这一职务，以前并没有，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1959年，新中国特赦第一批战犯后，周恩来提出建议：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委会中，增设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文史专员办公室。被特赦的战犯进入这个办公室，职务就是文史专员。

1983年，黄维出席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他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表达了对当年同甘共苦，如今还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怀念之情。他在给老同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1976年周总理逝世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黄维悲痛不已，参加了一系列追悼活动。他想起了，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周恩来总理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想起了功德林、秦城、抚顺的日日夜夜。他想起了，他不间断的生病，不断地受批判，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参观。他想起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和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情景。他想起了，妻子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安排，儿女们都上了名牌大学……桩桩件件都离不开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对黄维一家的恩情深似海，周总理的关怀说不尽。

黄慧南：黄维之女。原北京市崇文区政协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委员、民革崇文区工委主委。

章壮骧 书